



共享单车与共享经济

□ 王东京



济的特点有三：一是参与各方要以盈利为目的；二是要存在资源使用权闲置；三是使用权共享要通过共享平台进行交易。这是说，参与者若无盈利动机或社会上不存在闲置资源，或者使用权共享不是通过共享平台达成，皆不是共享经济。至于共享平台由谁创建不重要，既可由第三方创建，也可由供给方或需求方创建。

以公共品为例。众所周知，公共品的特点是使用不排他，此类物品使用权无疑是共享的。可是公共品的提供者（政府）不是赢利机构，而且供求双方也不存在交易，故共享公共品不是共享经济。早期共享经济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银行。由于社会上存在闲散资金，同时社会上也有人需要资金，于是银行作为共享平台一手吸存闲散资金，一手又将闲散资金贷放给需求者。如此一来，银行从中赚取利差，而资金使用权得以共享。

说银行融资是共享经济，读者应该不会反对，因为作为共享平台的银行是第三方机构。现在的问题是，共享平台若由供给方创建，共享使用权是否是共享经济？对此目前学界有分歧。要说清楚此问题，我认为关键在平台公司能否从事自营业务。若允许自营，供给方创建共享平台也是共享经济。

读者想想银行吧。对于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来说，银行无疑是第三方机构；但我们不要忘了，银行在办理资金存贷的同时也从事自营业务，比如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从这个角度看，银行其实也是资金的供给方。银行作为商业机构，在商言商，当然可以用自有资金放贷。可见共享平台由第三方创建还是由供给方创建并无本质区别，只要使用权共享是通过共享平台达成，就不会改变其共享经济的属性。

人们认为共享单车不是共享经济的第二个理由，是消费者共享的不是社会上闲置的单车，而是平台（公司）新提供的单车。前面说过，共享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共享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平台（公司）新提供的单车是否属闲置资源呢？这就涉及我们对闲置资源怎样认定。通常的解释，闲置资源是指在用户手中利用率不高的资源。这种解释不算错，但我认为过于狭窄，不全面、也不准确。

事实上，闲置资源有两种形态：

一是闲置在用户手中的资源。比如有人购买了两套住房，其中一套大部分时间闲置；二是闲置在生产者手中的资源。此类闲置又分产品闲置与设备闲置两种，前者指企业的滞销产品，表现为产品库存；后者指因需求不足而企业开工不足，表现为生产能力闲置。我的观点，出现上面任何一种情况，皆属资源闲置。

若这样理解闲置资源，共享单车所共享的显然是闲置资源。虽然消费者不是共享用户手中的闲置资源，但却共享了生产厂家的闲置资源。不妨设想一下，要是平台（公司）不生产厂家采购单车，这些单车是否会变成厂家的产品库存？或许有人说，没有平台（公司）采购厂家会少生产，可厂家少生产意味着什么？必是产能闲置对不对？

关于平台（公司）收取押金，我指出三点：第一，由于使用权转让有风险，供给方让需求方预付押金就如同银行让贷款者抵押财产，无可厚非；第二，若平台（公司）恶意侵占预付押金或携款跑路是违法行为，政府要依法打击。但不能因噎废食，将正常的风险规避行为当作非法融资；第三，共享单车是否收押金与它是否是共享经济无关，不可混为一谈。

回头再说共享单车的前景。目前共享单车遭遇困境，归根到底是盈利模式有缺陷。将共享单车与滴滴打车作对比，两者差别一目了然。滴滴打车也是共享平台，可出租车的所有权是分散的，车主能自己维护财产安全，监管成本相对低；而共享单车却由平台（公司）提供，监管成本当然会非常高，这也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公地悲剧”。

共享单车能走出困境么？前几天我与那位朋友通电话，他说他所在的公司去年收支已经打平，今年有望盈利。具体怎样盈利是他们的商业秘密，他没细说，我也没问。这里我推测一下，共享单车今年若真能赢利，一定是找到了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年底见分晓，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金融体系须关注的四个风险点

□ 胡新智

对于金融体系来说，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推进，金融体系内原有的消化风险机制可能不再适用，因为除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等传统领域风险外，债券波动、交叉金融产品、理财业务、互联网金融、外部冲击等非传统领域风险同样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威胁。

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点

部分小银行非理性扩张的风险。与大型银行相比，部分中小银行内在脆弱性突出，有可能成为区域金融风险的风险点。一方面，部分中小银行负债过度依赖同业资金，整体杠杆率偏高，受金融去杠杆的冲击也比较明显。另一方面，部分中小银行存在股权背景和股权关系复杂、公司治理不健全、风险内控机制薄弱、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经营行为偏离市场定位，高管人员频繁更迭，甚至存在大量关联交易、盲目投资等违规行为，很容易遭受政策变化和市场波动的冲击。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20多年，新设立很多商业银行，但还没有真正出现过银行破产倒闭的案例，要做好未来几个个别经营不善的小银行被兼并收购甚至直接破产倒闭的思想准备。

部分金融中介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风险。中国金融体系除了银行、证券、保险等几大类金融机构，还有信用评级公司、信用担保公司、资产评估公司以及大量类金融机构提供各种专业化的辅助服务。但与银证保受到严格监管不同，这些机构所受监管相对薄弱，或者游离于金融市场边缘，存在不规范经营行为。一是信用评级虚高的“评级泡沫”。主要表现在信用评级偏高、评级调整不合理、高评级债券违约等问题。二是信用担保公司偏离“担保”本意。一方面，正规融资担保公司数量少、收费高，成为融资难、融资贵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量非正规担保公司、包括很多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违规从事民间融资和资金调剂活动。三是类金融机构变相高息揽储、非法集资等现象依然存在。

产融结合背景下的资本套利风险。我国产融结合主要是产业资本主导，即产业资本实体把部分资本投入

到金融机构。自2010年以来，我国形成了一轮产融结合的高潮，催生了大量涉及金融的企业集团以及涉及金融的地方性控股集团。同时，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大量民营资本转型投资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布局金融业来加强对集团融资的支持和实现多元化经营，甚至不少大型民营企业将金融领域作为转型的战略方向。产融结合可以给企业带来多重好处，如满足金融服务需求、提高资本盈利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和创造协同价值等，但也蕴含内部交易复杂、账面资本虚增和掏空主业等一系列潜在的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盲目扩张的风险。“十一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之后大型金融机构开始尝试综合化经营。近几年，凭借在场景、账户、流量、数据、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互联网企业布局金融业务，形成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为一体的封闭“金融生态圈”。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的各类问题和风险也日益凸显。一是监管不完善。金控公司的监管责任主体不明确，集团整体和交叉环节容易出现监管盲点和监管空白。二是民营金控管理混乱。监管缺失滋生不透明交易、缺乏有效信用管理机制、治理不善、经营乱象等诸多问题。三是关联交易带来传染和规模风险。金控集团组织结构上的复杂性使得关联交易隐蔽性增强，投资者、债权人，甚至控股公司高管层都难以清楚了解公司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授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关联交易使得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单独子业务风险的溢出效应增大。部分金控通过控股金融机构大量举债，通过关联交易和业务交叉放大杠杆，导致金融控股集团过度膨胀，导致金控集团的集团风险放大。

防范金融体系风险的建议

做好中小银行风险的前瞻性防范。督促中小银行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战略定位，不要盲目开展多元化经营。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快补齐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短板，强化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完善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救助机制，针对部分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处置预案，重点盯防，

预先储备好直接注资、财政担保、组织其他机构接盘等救助手段，确保一旦有事可以快速响应、从容应对。

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范产融结合。2018年4月27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对产业资本投资金融机构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监管政策，包括严格准入条件、加强资金来源真实性合规性监管、规范关联交易、健全风险隔离机制等等。另据媒体报道，央行也正牵头开展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试点。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由央行牵头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产融结合的日常监测和并表监管。并表监管对象要把SPV公司包括在内，复杂业务监管要坚持穿透原则，并要求“定期报告”。此外，也应该加快建立专门针对中央企业的金融业务风险监控报告体系，防范个别央企脱离主业单纯做大金融业务。

做好金融业扩大开放背景下的风险防范。一是确保金融业开放与风险防范能力相匹配。坚持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对每一项即将开放的金融业务，都要先进行风险防控能力评估，避免因金融开放而发生的风险。二是加快出台和修订相关监管细则，填补监管空白。在对现有主要业务监管规定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制定监管制度立法计划，做到先规范后开放，国际接轨、监管有力。三是按照《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的有关精神，鼓励金融机构制定针对核心骨干员工的特殊激励政策，防范人才流失。

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潜在的金融风险，除了金融供给体系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居民包括很多小微企业金融知识匮乏，小微企业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在金融诈骗中上当受骗。金融知识宣传和普及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一是要加强立法，突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的整体规划，引入到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之中，并作为大学选修课程。三是要定向宣传，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群体、农村居民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服务，重点是提高这部分居民识别金融欺诈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核心阅读

党的十九大之所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正视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突出问题，对新时代“三农”政策适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准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段话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高度概括。其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或者总的工作思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讲从

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 朱 泽

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如何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早在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不光是提法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内涵上也在不断深化，反映了13年来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变化，也反映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较，乡村振兴战略有3个特点：一是强调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乡村振兴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矛盾也有很大不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反映了农业农村发展进入现阶段后的新形势新要求，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热切期望。二是强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追求目标。2017年农业科技贡献率贡献率达到了57.5%，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2亿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6%，实现了由人畜耕作为主向机械化耕作为主转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成为实现农业稳产增产的最主要推动力。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呈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农村

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正是出于同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考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农村现代化的任务，并将其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可以肯定地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的大背景下，推进农村现代化任务必将成为“三农”政策的重要目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像重视农业一样重视农村发展，坚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三是强调“五位一体”抓“三农”工作。过去，我们抓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的经验较多，但是对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关注不够。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坚持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把握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新的20字总要求，从“产业兴旺”切入，以“生活富裕”结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农业兴、百业旺，乡村才会有活力。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没有产业支撑，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适应农业主要矛盾的变

化，必须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一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宜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二是坚持融合发展。瞄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现代食品产业等新业态为引领，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农村产业体系全面振兴。三是坚持效率优先。今天的农业处于一个高度开放的环境。我们不能低御住外国农产品的冲击，关键要看我们农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解决农业效率问题，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条腿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但长期以来，这个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挥。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反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质的提升。现阶段，农民

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发展休闲旅游养老等新兴产业，吸引城市消费者，也要求有整洁的村容村貌、优美的生态环境、宜人的居住条件。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必须把“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突破口和主攻点，尽快改变许多地方农村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烧的脏乱差状况，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在五句话、20字总要求中，“乡风文明”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一句。形式上的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上的长期停滞，在有些方面实际上还有倒退。新的历史时期，抓好乡风文明建设，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在乡村治理理念上的深刻变化。治理更多地强调“法治”，管

理更多地强调“人治”；治理强调发挥政府、社会、个人的配合和协调作用，管理主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乡村治理是不是有效，一方面要看这个体系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要看这个体系是否充分考虑了农村的实际和特点，是否充分考虑了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影响。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为31.2%，即将跨越联合国划分的30%—40%的相对富裕标准，进入20%—30%的富足标准。这表明，即便按国际标准，把“生活富裕”作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也是切实可行的。实现“生活富裕”，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势头，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此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挖掘现有增收渠道潜力；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加大对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支持，增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加快推进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赋予农民充分的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新收入二次分配机制，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